

中国开国皇帝全史

8

千秋霸业

嬴政

刘邦

刘秀

司马炎

杨坚

李渊

赵匡胤

铁木真

朱元璋

努尔哈赤



图陈子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第八卷·元太祖

——中国开国皇帝全史

千秋霸业



铁木真 公元 13

世纪的中国,始终充满着刀光与剑影,充满着鲜血与白骨。一群从漠北高原纵马疾驰而来的充满野性的汉子,怀着必胜的信心书写了一段人类征服史上的神话。而创造这个神话的人,便是铁木真。

他,来自草原的雄鹰,从成为大汗的那一天起,便展开了双翅,翱翔在辽阔的

亚欧大陆上空。利爪所到之处,不论是能征善战的女真人,还是强悍的西夏人,不论是文明发达的汉人,还是不可一世的欧洲佬,无不被抓得血流满面、狼狈不堪。就连他的死,也是那么的悲壮、那么的可叹!

为什么只有人口百万,军队百千的大蒙古国,能够战胜地广人稠的金朝和南宋?为什么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能够灭亡先进的大国?他创建的那支震惊世界的轻骑兵是如何获得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的。难道铁木真真的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神力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怎样射落大雕、成为天之骄子的呢?

这就是历史。

目 录

第一章 “大蒙古”源流	(1)
一、从苍狼与白鹿谈起	(1)
二、九部分争	(8)
三、黄金家族	(31)
第二章 少年铁木真	(39)
一、在战乱中降生	(39)
二、定亲	(42)
三、颠沛流离	(46)
四、死里逃生	(54)
第三章 漠北硝烟	(67)
一、完婚	(67)
二、奇袭	(73)
三、一山不容二虎	(81)
四、宴会上的殴斗	(90)
五、铁木真热泪盈眶	(97)
六、大屠杀	(106)
七、父子之盟	(111)
八、议和	(119)
九、任马由缰	(129)

第四章	一代天骄	(151)
第五章	征服者	(173)
一、	“林木中百姓”	(173)
二、	跨越贺兰山	(181)
三、	金国的诏书	(189)
四、	远征序曲	(207)
五、	摩诃末之死	(225)
六、	大战阿里吉	(240)
七、	长春真人	(247)
八、	苍鹰折翅	(252)
九、	成陵之谜	(257)
第六章	天不假寿	(275)
一、	胸怀坦荡的窝阔台	(275)
二、	贵由西巡	(295)
三、	蒙哥之死	(303)
第七章	世祖践祚	(325)
一、	开平登基	(325)
二、	两个大汗	(335)
三、	平叛	(341)
第八章	大一统	(353)
一、	鏖战巴蜀	(353)
二、	招安	(374)
三、	华夷一统	(386)
四、	兵戎相见	(399)
五、	劳师远征	(408)

第九章 千秋功过任评说	(419)
附录 元太祖铁木真大事年表	(423)

第一章 “大蒙古”源流

一、从苍狼与白鹿谈起

打开明代翻译的《元朝秘史》，一个有趣的传说立即映入我的眼帘：成吉思汗的根源是天命所生的一只苍色的狼，与一只美丽的惨白色的鹿，结为配偶，成双成对，一同渡过腾吉思海子而来，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立下营盘，生下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取名为巴塔赤罕。这就是《元朝秘史》所说的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距离成吉思汗整整 22 代。

狼和鹿不能相配，即使相配也不会生出人类，这是人们的基本常识。因此对这个传说我并没有认真对待，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古老的神话而已。并曾一度相信了某些学者的说法，认为这是两个以“苍狼”和“白鹿”为图腾的氏族。古代人不了解人类的起源，往往将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自己的祖先，并以此作为本氏族的标志——图腾。正如商族以玄鸟（燕子）为图腾，周族以熊为图腾，突厥族以狼为图腾一样，蒙古族大概是以苍狼为图腾的氏族。但大量的史料又告诉我：古代蒙古人并没有图腾，更没有以苍狼和白鹿为族徽的习惯，《元朝秘史》的这个传说并非神话，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原来“苍狼”和“白鹿”并不是两只动物，而是以动物命名的蒙古族的两个人名，蒙文音译是“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汉语译为“苍色的狼”和“惨白色的鹿”。汉人和其他民族人不了解蒙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于是把他们当作两只动物，“狼鹿婚配说”由此而生，并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其实他们并不是狼和鹿，如同范文虎不是虎，蓝田豹不是豹，马云龙不是龙一样，他们是蒙古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两个人，是成吉思

汗所在的这支蒙古人的祖先。

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渡过腾吉思海子，来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之前呢？这件事还要追溯到更遥远的古代。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中国北部地区先后出现过许多民族的（或政治的）实体。由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动以及因之而引起的民族迁徙和民族混合，各民族的成分、名称、居地和语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民族在经历了盛衰离合之后，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因此，要完全解决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的族属、族源问题，是十分困难的。在蒙古民族形成以前，漠南北地区先后有匈奴，东胡、鲜卑、乌桓、柔然、高车、突厥、回纥、黠戛斯、契丹、室韦等民族的活动，前人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和语言资料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有些民族的族属问题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例如，匈奴人的族属问题就是歧见最多的问题之一。有人断言匈奴人属于蒙古族。他们根据汉文史籍中保留下来的一些匈奴语资料，拿来和蒙古语比对，据说找到了一些“一致”的词汇和语法现象，于是得出结论，说匈奴应属蒙古语族。通过语言的比较研究来识别古代民族的族属，无疑是重要的途径，但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如果既不讲究记录匈奴语的汉字古音，又不管蒙古语在历史上的变化，任意地拿来比对，难免要牵强附会，走入歧途。持匈奴即蒙古说者所提出的语言方面的论据，大多有这种情况。至今为止，有关匈奴语言和人种的研究成绩，最多说明它更可能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却根本不能证明属于蒙古语族。还有不少主张匈奴为突厥族，这种说法得到一些文献资料的支持。史籍记载说，敕勒的语言与匈奴略同（《北史·高车传》），五世纪时匈奴后裔在今巴尔喀什湖之东所建的悦般国，“风俗、言语与高车同”（《魏书·西域传》）；又说铁勒人是匈奴的苗裔（《隋书·铁勒传》），突厥是匈奴之别种（《周书·突厥传》）。当然，匈奴属突厥族说的论据仍是不够充分的。

东胡及其后裔乌桓、鲜卑、契丹、室韦等族的族属问题，也曾引起学者们的争论。上个世纪，有些学者提出东胡属于通古斯语族，“东胡”一名就是“通古斯”的译音的说法，某些著作中甚至干脆用“东胡”来译写民族学用语“通古斯”(Tungus)。这种说法毫无根据。“通古斯”本是从今贝加尔湖地区北迁到列纳河中游的突厥语族雅库特人对其邻近民族的称呼，后为扩张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所采用，最后被作为学术用语，用来概称分布在东起今库页岛、西至叶尼塞河中下游的语言系属相同的诸民族(通古斯语族)。把这个晚出的名称和公元前二世纪以前活动在今内蒙古东部的东胡扯到一起，是十分荒谬的。这种说法现在已被抛弃了。

东胡的得名，据东汉人服虔说，是因为他们的居地“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史记·匈奴列传》《索隐》)。三世纪末，东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余部保乌桓山，因号乌桓；东胡的另一支依鲜卑山而居，故称鲜卑，其语言、习俗与乌桓同(《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东汉时期，乌桓人大批入居塞内，后渐融合于汉族。鲜卑人则乘北匈奴败逃之机，徙据匈奴故地，复渐南移近塞。没有西迁的一部分匈奴人也自号鲜卑，后来遂融入鲜卑人中。二世纪中叶，鲜卑首领檀石槐曾统一东、中、西三部鲜卑，建立强大政权，但不久便分裂了。三世纪中，东部鲜卑慕容部、段部和宇文部兴起，慕容部的一支迁到今甘肃、青海地区，后来称吐谷浑；西部鲜卑的拓跋部崛起于代郡之北，四世纪末建立强盛的北魏王朝，并统一了中国北方。这时，在东部鲜卑故地今西拉木伦和老哈河流域有契丹部，其北，即古所谓“鲜卑山”地区(大兴安岭北段)有室韦部，先后服属于拓跋鲜卑王朝。室韦与契丹同类，语言也相同，都是鲜卑的后裔。有的学者认为，室韦与鲜卑两个译名所本的原文是相同的，似应为 Serbi, Sirbi 或 Sirvi，这就是说，两者的族名本来是相同的。拓跋鲜卑是从鲜卑山南迁后

吸收了匈奴等族人而形成的部落，据《魏书》记载，他们先人的“旧墟石室”在乌洛侯部（室韦之一部）居地之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遣人致祭，并刻石纪念。最近，考古工作者在今内蒙古鄂伦春旗西北发现了这个石室，进一步证明了鲜卑与室韦居地的一致。以上的历史概述表明，从东胡到契丹、室韦，是一脉相承的同一系统民族。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东胡后裔诸族的语言与蒙古语有共同的祖源。例如，《南齐书·魏虏传》记录了拓跋鲜卑语中表示具有某种身份或职务者的十三个单词，其尾字都是“真”，如文书吏为“比德真”，通事人为“乞万真”，作食人为“附真”，乘驿人为“咸真”等，这和原蒙古语表示相同意义的-chin 后缀完全一致。契丹语表示所有格的附加成分有-ən, -an, -in, -on, -un, 和蒙古语表示所有格的-yin, -un~ün, -u~ü 应是同源。有若干鲜卑语和契丹语词汇，与蒙古语相同或相近，如鲜卑语“阿干”（兄，蒙古语 aqa），“纥真”（三十，蒙古语 ghuchin），以及上述“比德真”（蒙古语 bitekchin）、“乞万真”（蒙古语 kelemechin）、“附真”（蒙古语 ba, urchin）等；契丹语“陶里”（兔，蒙古语 taulai），“捏褐”（犬，蒙古语 noqai），“讨”（五，蒙古语 tabun）等。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证明了东胡后裔鲜卑、契丹的语言与蒙古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这对解决蒙古族族源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蒙古族的直系祖先，是和鲜卑、契丹人属同一语族的室韦各部落。

室韦的名称最早见于《魏书》记载，作“失韦”，隋、唐时代的史籍通常都写做“室韦”。这是对当时分布在契丹之北、靺鞨之西、突厥之东（约当今洮儿河以北，东起嫩江，西至呼伦贝尔的广大地域）诸部落的统称，其中的大部分应族属相同。史称他们为“契丹之类”、“契丹别种”。六世纪时，室韦人分为五大部：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和大室韦，不相统一。从东

魏武定二年（五四四年）起，室韦人就不断遣使到中原“贡献方物”。突厥强盛后，室韦受其统治，突厥设三吐屯总领之。其后室韦各大部又渐分为若干部落，各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有些部落还出现了酋长世袭的现象。唐贞观三年（六二九年）时突厥势力衰落，室韦人继奚、契丹之后归附唐朝，自此贡使不绝，有些室韦部落酋长还被命为都督、大都督之职。由于关系密切，唐人对室韦诸部的了解就比前人更详细了。

据两《唐书》的记载，室韦人的分布地域西面达到俱轮泊（今呼伦湖——达赉诺尔）。其最西的乌素固部落，居俱轮泊西南，自此迤东有移塞没、塞曷支、和解、乌罗护等部。俱轮泊四周都是室韦人的居地。“大山”（当即今大兴安岭北部）之北的大室韦诸部落，傍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而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今嫩江）、忽汗河（今松花江）合，……东流注于海”（《旧唐书·北狄传》）。据此知室韦乌素固等部落及西室韦（乌素固等部落似是西室韦的分部）居住在今呼伦湖周围和额尔古纳河上游一带，大室韦部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中下游地区，而蒙兀室韦（似是大室韦的分部）的居地则应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之东，大兴安岭北端。

室韦的西面与突厥紧邻，并曾受到这个强邻的统治，但在突厥文史料中却不见这个名称。唐玄宗开元廿年（七三二年）所立的《阙特勤碑》突厥文部分，载有其四邻部族和国名，称其东邻为“三十姓达怛”（Otuz-Tatar）。据碑文中各部的排列顺序，三十姓达怛的地理位置应在骨利干东南、契丹之北，正与唐书所载室韦诸部相当。达怛既称三十姓，必是大部，唐人应该是知道的。但这个名称到唐朝后期才出现于汉文文献：会昌二年（八四二年）李德裕所撰《赐回鹘嗢没斯特勤等诏书》中提到一个回鹘左厢部落叫“黑车子达怛”（见《会昌一品集》卷五）。按黑车子是室韦的

一个部落，据王国维考证，即《旧唐书》所载和解室韦。《辽史》中即载有“黑车子室韦部”。但此处却称为“黑车子达怛”，可见达怛与室韦实为同一部族。大抵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汉文文献中把契丹之北的诸部落统称为室韦，而突厥人则把他们统称为达怛——这可能是取自紧邻突厥的一个强大的“室韦”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唐朝后期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达怛名称，又似乎是从回鹘人那里传来的。回鹘政权崩溃后，其“种族离散”，西迁南移。室韦——达怛人乘虚而入，大批地进入漠南北，从此在这个广阔草原的舞台上扮演历史的主角。而“达怛”的名称，随着突厥、回鹘人的足迹带到中原和西方。人们用它称呼蒙古高原各部，甚至一些突厥部落（如乃蛮）也被称为达怛。至于室韦一名，辽人虽仍用以称呼北方一些部落，但范围已大大缩小。此后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两《唐书》所载室韦诸部中有一部称为“蒙兀室韦”，这是最早见于著录的蒙古名称。“蒙兀”的唐代读音为 *munḡ-nḡwat*，唐人用 *t* 尾韵母字译写他族语带 *l*、*r* 尾音的音节，因此“蒙兀”正是蒙古名称 *Mongghol* 的正规译音。在宋、辽、金时期的汉文史籍中，这个名称有“萌古”（《辽史》）、“朦骨”（《松漠纪闻》引《契丹事迹》）、“蒙古里”（《契丹国志》）、“萌古斯”（金《完颜希尹神道碑》）、“萌古子”（《三朝北盟会编》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盲骨子”（《松漠纪闻》）、“萌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蒙古”（这个译名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引《炀王江上录》）等等异译。这些译名有一个特点，就是将蒙古原名的第二音节 *ghol* 读成 *go*，语尾失去 *l* 音（除“蒙古里”外），有些还加上复数语尾 *-s*。这显然不是从蒙古语原音译出，而是通过他种语言的中介译出的。按清代满语称蒙古为 *monggo*，语尾无 *l* 音，其复数形式作 *monggos*。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他们的语言应极相近，满语的 *monggo* 大概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对蒙古的称呼。这

应该是“蒙古”译名的由来。成吉思汗建国以后，有些金国降人帮他用汉文书写对金、对宋的公文。他们把这个从女真语重译的名称转送给他，将他的国号写成“大蒙古国”。于是“蒙古”又以蒙古人自称的国号而为金、宋人所知，从此就统一用这个译名了。

两部最重要的蒙古史书都记载了关于蒙古人祖先的传说。《元朝秘史》说：“成吉思合罕的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Borte-chino），与一个惨白色的鹿（Qo'ai-maral）相配了，同渡过腾汲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著，生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第一节总译）狼祖传说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很早就有，早在《史记》中就记载着乌孙王昆莫是狼乳育长大的故事。其后，《北史·高车传》（《魏书·高车传》系从《北史》补）记载了高车人的始祖父是狼的传说，而《周书·突厥传》所载突厥人的祖先传说，则谓其始祖母是狼。故事的情节也越来越详。白鹿传说的起源也很早，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就记载了突厥先人射摩与海神女交往中，海神女以白鹿迎射摩入海相会，以及命射摩射金角白鹿的故事。蒙古人的狼鹿祖先神话，与上述各族一样，反映了他们先民时代的图腾观念，毫不足奇。

拉施都丁《史集》的记载是这样：

“大约距今二千年前，古昔即被称为蒙古的部落，与其他突厥部落发生了纠纷，终于诉之战争。据值得信任的可尊敬的人们口头转述的一个故事说，其他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并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屠杀，活下来的只有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这两家人逃到了一个僻远的地方，那里周围都是山林，除了一条狭窄难行的小径之外，别无他路可通。那些山中间有丰富的青草和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为额儿古涅昆（Ergunekun）。kun的意思是“山坡”，Ergune——“险峻的”，换句话说，就是“险峻的山岭”的意思。那两个人的名字是：捏古思（Neküs）和乞颜（Kiyan）。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就长久地留居此地，生息繁衍着。……”

“当这个民族在那些山林中间繁衍日多，地盘日益狭窄而无法容纳的时候，他们互相商量，用什么好办法能从这个险谷狭路中出去。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有铁矿的地方，那里经常溶化出铁来。他们全体集合起来，从树林中弄了很多柴薪和木炭，又宰了七十头牛和马，取下整张皮，制成锻铁风箱。随后将柴薪和木炭堆到那个山脚下安放停当，让七十个风箱一下子煽起火来，直到那个山坡熔化。结果从那里得到无数的铁，并开辟了一条通路。他们全都一起出了那个狭地，到广阔的草原上游牧。”拉施都丁又引述“诚实的历史讲述者”的话说，所有蒙古部落都起源于逃进额儿古涅昆的那两个人的氏族。而孛儿帖·赤那（意为苍色狼）则是那两个人后裔中一些部落的首领。

传说中蒙古人的额儿古涅昆，是十三世纪蒙古人对祖先所居故土的可贵记忆。它无疑是指今额尔古纳河之东的山地，和《旧唐书》所载蒙兀室韦的居地正相符合。足证蒙古部是从这一支室韦部落发展来的。其实，早在南宋初年，洪皓在所著《松漠纪闻》中就已明确指出了蒙古部与蒙兀室韦的关系。他说：“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曷骨国，……即唐蒙兀部。”

二、九部纷争

七世纪上半叶蒙古高原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室韦人非常有利。强大的突厥政权衰微了，漠北铁勒各部首先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于公元六二九年建立了以薛延陀部首领为盟主的政权。与此同时，奚、契丹和室韦也相继脱离突厥统治，归附唐朝。六三〇年，突厥政权为唐所灭，漠南地区统一于唐。漠北的薛延陀政权只存在了十八年（六二九——六四六年），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其势力，就在回纥和唐的攻击下灭亡了。于是铁勒各部也一起归附唐朝，唐朝政府各因其地设置了六都督府、七州，即以各部首领为都督、刺史，置燕然都护府统辖之。其中回纥部的势力最大，据有仙娥河

(今色楞格河)和噶昆河(今鄂尔浑河)流域;仆骨、同罗、多览葛、拔野古、契苾、浑、阿跌等部,分布在独乐河(今土拉河)以北和以南,以及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上游一带;回纥之西则是葛逻禄、拔悉密等部。唐朝采取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回纥等部首领基本上也恪守唐朝的规定,漠北地区在数十年中比较稳定,没有出现足以吞并邻部的强大政权。这使东面的室韦人免除了强邻的压迫,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七世纪末,当突厥人再度兴起,并企图重新征服四邻的时候,室韦人——“三十姓达怛”就已经是不那么容易征服的对手了。

室韦——达怛人何时开始向西迁移,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由于他们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去占据漠南北广大地区,因此他们的西迁在最初阶段只是逐步的、分散的过程。两《唐书》记载室韦各部的分布,大致是反映了七世纪的情况。那时他们仍居住在今呼伦贝尔地区,其西界最多达到克鲁伦河下游和额尔古纳河之西不太远的地方,因为再往西就是铁勒人和突厥人的地盘了。当然,在这个时期,可能有个别室韦——达怛部落,趁着漠北无强敌的机会,逐步地向西面寻求新的牧场。

室韦——达怛部落出现在漠北腹地的最早记录是八世纪初年。据突厥文《毗伽可汗碑》的记载,当毗伽可汗三十二岁时(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突厥出兵征讨乌护(铁勒)人民,破其汗庭。乌护人与九姓达怛(Tokuz-Tatar)联合起来,在Aqu地方与突厥作战。Aqu之地的确切位置不明,但大致应该在铁勒居地的中心独乐河左近。这说明,一部分室韦——达怛人此时已进入铁勒人的居地,并参与了他们的斗争。这个时期,由于后突厥统治者的压迫,大批铁勒人离开他们的故土,南徙入唐。他们抛下许多良好的牧地,正为室韦——达怛人的西迁提供了好机会。

上述“九姓达怛”可能是最早一批西迁的人数众多而又比较

强大的部落。在此后的漠北历史事件中，他们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七四四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回纥药罗葛氏首领骨力裴罗推翻后突厥汗国，建立了回纥汗国。回纥可汗为征服漠北各部进行了多次战争。据突厥文回纥葛勒可汗磨延啜纪功碑记载，九姓达怛人曾与八姓乌护联合起来，在 Bükägük, Burqu 和仙娥河等地与磨延啜的军队打了几次大仗，他们遭到了失败，一半人归附了回纥，另一半则避入地处，回纥可汗并没有把他们完全征服。从这里可以看出，到八世纪中叶，九姓达怛已经成为漠北一支比较大的力量，而且曾深入到了仙娥河地区。但是，在这以后，有关九姓达怛的活动即无明确记载。王国维推断说，《新唐书·地理志》所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载，从西受降城至回鹘牙帐的路上有个达旦泊，在崑崙河上游的回鹘牙帐东南，当是九姓达怛的居地。那么，这应当是上述服属于回纥可汗的一部分达怛人了。

八世纪后期，一部分室韦人逐渐向西南迁徙，大约到了今内蒙锡林郭勒盟地区，遂与奚人（居今西拉木伦、老哈河和滦河上游一带）接界。七八八年，一队奚和室韦联合的军队袭击了振武（今内蒙和林格尔县）境，大掠人畜而去，唐振武节度使遣骑兵七百会同正在振武的回纥迎亲使者率领数百骑去追击，结果回纥使者竟为奚、室韦所杀。这一支室韦人可能就是后来活跃在幽州塞外的黑车子室韦（即《旧唐书》所载之和解室韦）。九世纪初，进入漠南的室韦人继续分散地向西移动，出现在天德（今内蒙乌拉特前旗东北）、振武塞上，也就是说，到了阴山地区。

到九世纪，回鹘汗国衰败，终于在八四〇年被黠戛斯部所灭。回鹘“种族离散”，或西迁，或南奔。黠戛斯人统治回鹘汗国故地的时间似乎不很长，八四八年，他们曾发兵攻打室韦，抢夺了被室韦人瓜分的回鹘余众而去，此后就不见他们在漠北有什么重大的活动。看来黠戛斯的主要力量很快就退回剑水（今叶尼塞河上

游)故乡,并没有在噶昆河上游建立强大的游牧政权。九世纪下半叶的蒙古高原处于无霸主的状态,而原来的主要居民回鹘人又大多数迁走了,这自然是达怛人扩展地盘的良好时机。到十世纪前期,从今克鲁伦河到杭爱山地区,已经到处都是室韦——达怛人的部落了。《辽史·萧韩家奴传》说:“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耶律阿保机西征在天赞三年(九二四年),进兵路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事,三个月内就到达回鹘故都——古回鹘城(又名窝鲁朵城、卜吉罕城,今蒙古北杭爱省哈刺八喇哈孙即其故址),征服了这些地区的阻卜各部。“阻卜”是辽人对蒙古高原许多部落的泛称,或写作“朮不姑”,为区别不同部落,《辽史》中还用了“北阻卜”、“西阻卜”、“西北阻卜”等名称,有时也记录了某些阻卜分部之名,如“阻卜札剌部”等。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阻卜这个族名进行过许多研究,现在大体可以肯定,辽人所谓“阻卜”,就是达怛的异称。从《辽史》记载的阻卜部落分布范围看,他们已据有了今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当然,在阻卜(或达怛)的泛称下可能包含有非室韦——达怛系统的部落,但其主体应是达怛即蒙古语族部落当无疑问。我们知道,著名的于都斤山(今杭爱山)曾是突厥和回鹘汗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后来畏兀儿人的祖先传说还把这里当做他们先人的兴王圣地。可是十一世纪哈刺汗朝人马哈木·喀什噶里所著的《突厥语大辞典》却说,于都斤山是在达怛人的地域之内。这也反映了漠北草原已经易主的明显事实。

十至十二世纪,蒙古高原各部先后受辽、金王朝的统治。辽置西北路招讨司管辖胪朐河以西阻卜等部。辽圣宗时,西北路招讨使(又称“阻卜都详稳”)萧挾凛镇压了阻卜等部的叛乱,在阻卜之地建立了镇州、防州和维州三城,从此以镇州城(亦称可敦城,即今蒙古布尔根省喀鲁哈河下游南之青托罗盖古城)为西北